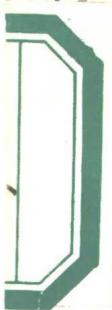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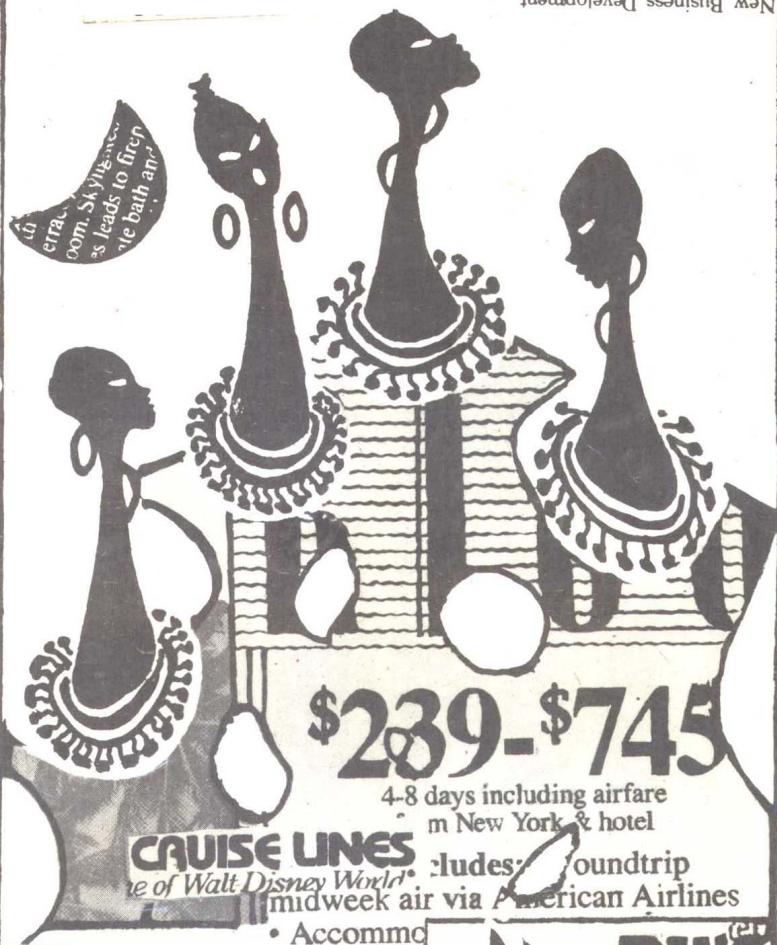


世界報刊選萃

第6輯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Real Estate Dev'e
Research & Development

Research & Development Laboratories



WORLD'S NEWS & VIEWS

PIU The

RICO

葛罗米柯忆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会见

尼克松论邓小平

特异功能事属子虚乌有

美国华人人才济济

世界经济明年可能出现大萧条

基洛夫被害内幕：策划情杀除政敌

高效而廉洁的新加坡政府

日本在教育竞赛中大大超过美国

《联共党史》是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叶利钦在一九八七年苏共中央全会的讲话（全文）

中国人必须学会研究危机

美国总统智囊团预测：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一要目

编 委

邦 邦

程克雄

张建国

成 一 根

湘 翔

刘茂俭

方 积

仲 方

黄 彦

根

永 黄

建

立

民 彦

茂

立

永 黄

建

立

方 翔

立

立

主 编

丁 丁

祖 小

建 翔

立

副主编

永 方

永 翔

立

对华反应

▲美国总统的智囊团预测如果海峡两岸化沟为桥中国在2010年会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8) ▲中国人必须学会研究危机 (4) ▲交易中心的形成使老式华丽建筑所剩无几
(11) ▲上海机场难忘的迎接
(14) ▲正在从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精神病研究 (17)

海外论坛

▲叶利钦在1987年苏共中央10月全会上的讲话(全文)
(20) ▲清除官僚主义腐蚀
(2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25) ▲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28) ▲甲午海战后中国一亿两白银赔款用于何处? (29)

全球话题

▲萨哈罗夫谈: 奥氧层需

要保护 (30) ▲拯救伏尔加河
(32) ▲美国的核污染 (35)

教育纵览

▲日本在教育竞争中大大超过美国 (37) ▲布什保证兑现竞选诺言: 当“教育总统” (39) ▲美国教育现状 (40)

启示录

▲高效而廉洁的新加坡政府 (42) ▲监督政府的英国“四位一体”的监督体系 (45) ▲澳大利亚关于廉政的严格规定 (47)

历史一页

▲基洛夫被害内幕: 策划情杀除政敌 (49) ▲赫鲁晓夫为何在“联大”用皮鞋敲桌子? (52) ▲西班牙“无敌舰队”覆没新说 (53) ▲惊回首, 不白之冤何多其?

一个苏联肃反人员的回忆 (55)

环球纵横

▲世界经济明年可能出现大萧条 (57) ▲“超工业化国家”日本的诞生 (58) ▲日本闯入巴黎金融市场 (61)
▲“日本威胁论”渗透美国国会 (63) ▲“商业海盗”对知识产权的极大侵犯 (65) ▲软件掠夺使日本公司损失 2 亿美元 (67)

华裔风采

▲美国华人人才济济 (68)
▲太空衣设计者唐鑫源 (69) ▲美国华人经济稳步发展 (70) ▲为振兴中华而效力——香港著名企业家胡应湘 (71) ▲名传万世的旅法华工 (73)

科技瞭望

▲“特异功能”事属子虚乌有 (75) ▲矮子是否有优势 (79)
▲海中诞生的婴儿 (81) ▲英国的“细菌歇斯底里” (82)

西窗剪影

▲日本人的“过劳死”与

“家庭恐怖症” (84) ▲美国上班族染上工作狂热症 (86) ▲美国的“第三世界” (87)

传播业天地

▲笼罩报业的阴影 (88)
▲《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职业道德法典》草案摘要 (90)

国外书摘

▲尼克松论邓小平 (93)
▲葛罗米柯谈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会见 (97) ▲中国暗杀大王一书序言和引子 (100)

漫画与幽默

▲古风新风——仿李白老先生古风三章 (103) ▲国际幽默漫画选 (104)

医疗与文明

▲优生学的复兴 (106) ▲新兴的时序生理学 (108) ▲寿星之乡比尔卡班巴 (110) ▲苏联研制返老还童新药成效显著 (111) ▲世界上五百种可食昆虫 (112)

中国人必须学会研究危机

香港《广角镜》月刊

1989 · 3

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最好的向导，危机是教人们进行创造的最好的老师。看到问题就是看到出路，碰到危机就是碰到机会。国家主要决策人的思想方法，对国家的发展影响极大，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成了新时代最强的呼声。中国最大的不幸是陷入“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深渊，耽心“危机”概念会带来恐惧心理，于是不断向人民提供“美好的图景”。美国人的方法是不断提出疑难、指出困境、预告危机，请决策人设法解决。

危机！危机！

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一连串所谓“全球问题”的发现：人口的压力愈来愈重，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生态平衡受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粮食紧缺，经济运转遭遇重大障碍，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精英主义陷入泥潭，旧的

思想观念和方法一一碰到困难。大国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不仅明显缺乏理性，而且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这并非仅仅因为已有的核武器存量足够毁灭人类多少次，更重要的是，人们忽然发现，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有可能从外部的军事入侵转为内部的各种危机。

他的最大贡献正在于集中研究各种令人不愉快的前景。”

赫赫有名的罗马俱乐部，一向以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为宗旨。他们的研究，从自然资源、经济环境的破坏，转向社会与人类领域的种种危机问题。著名的赫德森研究所所长H·卡恩是个怪杰，被人称为“职业乐观主义者”，而他所主持的研究所的最大贡献正在于：“以非同寻常的深度和广度在其大部分工作中，集中研究了各种令人不愉快的前景”。

美国不论在实际上，还是在一般人的意识上，一直是个危机不断的国家。30年代初的大危机，几乎使美国政府垮台。在70年代，美国同样出现了一连串的危机。1976年，A·托夫勒在纽约发表的《生态痉挛症的报告》中就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关于富裕、闲暇和无限增长的所有观念都被推翻。人们面对日益增长的、不久前还是完全不可想像的社会危险，一下子把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好期望推到一边。”

很奇怪的是，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对“危机”的说法，都抱着反感的态度。苏联一直没有或不容许有人研究危机问题。中国的情形亦一样。匈牙利的A·盖多可能是

一个代表。他在1982年出版的《当代哲学中的危机意识》一书中认为，“危机哲学”是跟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的，也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危机。盖多那样专家感兴趣的只是“危机”概念本身对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否有利，“危机”是否会涉及到管理者、决策人的责任，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是否会带来恐惧心理。他们不相信拉罗什福科在《道德箴言录》中的话：“希望和恐惧不可分离，没有希望就没有恐惧，没有恐惧就没有希望。”

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向导

事实上，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最好的向导，危机是教人们进行创造的最好的老师，看到问题就是看到出路，碰到危机就是碰到机会。对于勇视现实，自觉接受挑战的人说来，问题就是希望，危机就是转机。或者简单地说，只有在危机中不能警觉新转机到来的人，将会终身真正的危机。

中国最大的敌人可能是自己

现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大过渡的时期，正处于从自足自乐的慢节奏向竞争拼搏的快节奏急剧转化的关头。

任何一个用坦率的、开放的眼

光来观察事物的人都会看到，当今正在谋求发展的中国充满了问题、疑难、困境和危机，这情形就像世界所碰到的全球性问题、疑难、困境和危机一样。

过去，中国曾经用一场革命来推翻“三座大山”，却忘记了用另一场革命来摆脱保守、愚昧、落后、无知四大灾难。

人类发展到今日，各国人民所追求的理想已差别不大，差别最大的，就是方法，尤其是主要决策人的思想方法。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成了新时代最强的呼声。

中国一直以精神巨人自居，但我们最不幸的，无可挽回的错误之一，就是往往不慎跌落在思想方法的深渊里。一方面，在思想上我们常常把“辩证法”实证化，甚至是实用主义；另一方面，在实际上我们又常常把问题“片面”化，甚至是诡辩论。喜欢一窝风、一面倒，唱高调，讲空话，结果使精神与物质、逻辑与实证、过程与结果、前提与条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因而，实际的行动就不能不常常表现为颠三倒四了。

解决问题要善用其法

中国当前发生的这场大变革的核心正在于观念的变革和思想方法的变革。中国人，如果不重新注重原

则性思想方法，发展抽象与形象结合的新思维方式，发展个性化、多元化的科学方法，要想摆脱“形而上学”模式的思维方式，也是没有希望的。思维方式也需要换代，它像多级火箭，要抛弃已完成任务的初级系统，要及时开动预先准备的系统。

缺少有效的综合协调技术

我们知道，天才一旦成“圣”就会害人。科学史上有不少例子说明，由于对某些已知事实探取新的观点而获得伟大的发现。有时，天才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妨让“庸人”来试一试。一百多年前，德国商人施利曼重读无人不知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忽然产生一个与所有天才学者不同的想法：《伊利亚特》所写的事可能全部是真实的。于是他按荷马的描写去挖掘特洛伊，最后，竟然给他找到了普安皇帝的宝藏！

如果把今天中国的建设问题借喻为荷马的史诗，为了破题解难，不妨让一些“宽松”的方法去试一下，让那些爱好“横比”可能忽生奇想的“庸人”们去努力奋斗一下又何妨？

靠军事手段搞经济是不行的

事实上，跟科学界的情形一样，目前所有有为的政府都在寻找

大统一的协调点：政治结构与权力的协调；物质、人口与精神三种生产的协调；生产、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协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协调；发展速度与稳定性之间的协调；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技术文化的协调。中国过去靠军事手段，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靠“各个突破”那些方法来搞科学技术、教育、经济和文化建设，虽有些收效，但损失亦很大。中国所缺少的是精密有效的综合协调技术。

事情还仅仅是开始。对不愿意彻底改变旧观念的人来说，更大的痛苦还在后面。

下面再让我们来比较一个眼前的例子。1977年，美国卡特总统下令研究“到本世纪末时，世界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以此作为“我们长期规划的基础”。研究报告说：“我们在报告中所作出的结论，颇令人不安。它指出，到2000年时，可能会发生规模惊人的世界性问题。”接着就是这个困难，那个危险，这个变质，那个灭绝。整个报告，指出不少无法解决的问题，一片危机感。这个报告传出后，1981年中国也提出要开展《2000年的中国》研究。同年（1981年）3月8日，总书记胡耀邦指示：“要研究本世纪末中国将展现

出一幅怎样的图象？占世界人口1/5的我国人民那时将过着怎样的物质文化生活？希望通过调查研究描绘出具体生动的前景，以激励人民为之奋斗。”现在，72卷巨型报告出来了。作为报告主体的十大预测，果然是对“生动的前景”的描述，全是乐感型的喜鹊、布谷鸟之声。所谓“五个大方面的困难”，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的东西被提到。

正视问题，少唱些

赞歌

美国人的方法是不断提出疑难、指出困境、预告危机，请决策人设法解决；中国人的方法却是不断向人民提供“美好的图景”。

正如悲剧具有无比的激发力量一样，杜鹃与鸟鸦的声音有时足以叫醒人们去行动。为了使中国人不仅要成为思考的一代，而且要成为行动的一代，中国实在必须面对事实，并切实解决问题，扬弃夸夸其谈的陋习。在历史的事实面前，唯有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冷静解决困难、化解危机的人，将来才会有希望。

（李云 摘编）

陈平

美国总统的

如果海峡两岸化沟为桥中国

各国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其内因，而且取决于它在世界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台峡两岸如无一个清醒的全球战略配合的经济发展，长期的前景彼此都不乐观。

令人深思的是，大陆和台湾都把保障台湾海峡稳定的希望寄予在东亚无所作为的美国，然而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似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具备制订全球战略的地位和可能。最近美国总统长期战略委员会预测中国在2010年会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并以此为制订长期军事战略的依据。这对台湾海峡两岸埋首内部事务的中国人，倒无疑是一帖清醒剂，我们应当从全球经济战略的角度来重新估量自己的地位和机会。

在朝鲜和越南战争的痛苦之后，亚太地区的主流已经从独立转向发展。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者多次预告太平洋时代的来临，但是东亚并未像西欧那样形成经济联合共同发展的局面，基于历史原因的互相猜疑，阻碍了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但是经济上的互相需要，长远看是比政治上的分歧更加巨大的向心力。问题在于缺少一个有力的推动者。近年来美国国会保护主义的情绪抬头，限制了美国政府在国外扮演更多的角色。日本虽然有资本和技术，过去的扩张历史使日本像西德那样不能担任经济共同体的发起人。看来，历史的机会将落在中国肩上。

大陆具有广大的市场、未开发的资源和相当规模的科技实力，却缺乏外汇和经商的人才。文化和体制的障碍也使西方商人

智囊团预测

在2010年会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台湾恰好有资金和商业人才，需要的是原料、市场和重工业技术。假如大陆和台湾能撇开政治的歧见先行经济联合，则目前的出口能力，大陆、台湾、香港加起来已经超过日本出口额的一半。联合发展的潜力不久将可与日本匹敌，这将极大地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

我们注意到欧洲共同体是以法国、西德在均衡基础上的联合为发端的。联合的中国、日本和美国构成的三角关系有可能发展为类似法国、西德、英国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而成为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以进一步吸引其他亚洲国家加入共同发展。要是台湾海峡化沟为桥，中国和太平洋地区股市的前景就都看好了。如能实现太平洋世纪的构想，则21世纪的世界金融中心将为纽约、上海、伦敦。恢复了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上海将成为黄金之地吸引世界的资本，中华民族将具有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犹太民族一样的经济潜力。中华民族的政治家们假如从全球经济战略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各自面临的内部问题，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

反之，假如台湾海峡两方的政权囿于“主义”之争而坐失良机，或甚至某些人士以“独立”“自决”的盲动引起冲突升级，则台湾海峡的风浪可以轻易地动摇以外贸为命脉的台湾经济，并使以开放为前提的大陆改革逆转。这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再入困境，也不会给亚太地区的任何国家带来好处。

中国经济的联合和太平洋经济区的发展并非是我们“一厢情

愿”的计划，而是和美日等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实际可能。40年代日本的大东亚共同圈和50年代美国的太平洋盆地区域的计划，都由于一国独大及军事色彩而深遭邻国的疑惧。处于发展中地位的中国，如今倒能处于倡议和主动的地位，假如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首先成功地化解自己的障碍的话。一个联合繁荣的中国及共处共荣的东亚，才能说服越南、苏联和印度这些潜在的对手转为发展的伙伴。美国每年数以数千亿美元计的军备竞赛不足以吓阻苏联的扩张，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却在几年间影响了苏联朝野在全球政策上的转向。这清楚地表明，中国虽然在核军备和贸易战上不如苏联和日本，但在决定全球潮流的演变上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如今，在美、日、苏都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者切莫错过这百年不遇的机会。历史将会作证：中国的开放与联合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的贡献，要比美苏战略协定更为深远。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如果得以形成，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将扮演主导而非霸主的地位。那时再传播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宏大传统，在世界上的反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任何文化的生命力的检验在于它能否应付时代的挑战，并在竞争中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不应当停留在空泛地争论中国民族和文化的优劣，而应当严肃地思考中国全球地位的演变和对策。这才是一个向前看的民族的希望所在。

为实现中华经济联合体，我们认为第一步需要的不是具体的规划，最重要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共识。大家从全球而不是单从大陆、台湾或某一华人点作为讨论国是的基础，其余的步骤便会应运而生。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的范畴似乎还不足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要争的是民族的兴起和世界的共荣，不是以往的正统地位。要是国弱民穷，名位又值几何？！

（朱云 摘自在纽约出版的
《海内外》双月刊，1988·11·）

贸易中心的形成使

古老华丽建筑所剩无几

一九八九·四·二十一
联邦德国《商报》杂志
〔德文〕

当代中国只有寥寥无几的几座城市至今仍以其名胜古迹、神秘色彩、建筑风格或历史性建筑引人注目。象北京的故宫、上海的口岸、桂林秀丽的山水和西安的兵马俑都属于这类城市名胜之列。

在战争和革命年月，在摆脱住房困境大兴土木的时代，无与伦比

的建筑艺术未受多大破坏，使当年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感到钦佩。后来，多数城墙、城门、庙宇和宝塔遭受破坏或挪为他用。6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红卫兵使饱经风霜的这些城市濒临绝境。

北京也未逃脱这样的命运。中国毛之后的时代虽做了大量修复工作，但北京原有的魅力正在消失。中国首都变成了一座色彩单调的城市——统一格式的住宅楼、宽阔的大街、花园式的外交公寓、办公大楼和饭店群。这座城市已无诱人之处。沉睡了数个世纪的明陵每天都有数百个旅游团熙来攘往，在通向陵墓的6.4公里的大道上热闹非凡。故宫的监护人张中培（音）关心的是铺路砖，它正遭受数百万双鞋的磨损。去年，故宫的参观者有时每天多达7.5万人，太和殿拥挤的人群犹如香港地铁。

北京是一座拥有众多旅游胜地的贸易城。脑中有这种概念的人不会有失望感。首都兴建饭店是为接待来中国做生意的人。这些人公文箱中没有浪漫式的幻想。他们整天坐在谈判桌旁同中国伙伴谈判。北京新建的饭店似乎要使这些来访者

工作之余忘却自己在什么地方。这些饭店和房间都按国际标准陈设。有些客人一夜醒来很难忆起他在哪国。拉开窗帘也易使人弄错：人们从北京新建饭店多数房间向外眺望，只能看到其他饭店的建筑工地。

北京目前已开张或1991年开张的新饭店有33座，其中部分饭店相当宏伟。1978年中国打开门户之后，外国来客的增长速度逐步放慢。1984至1987年外国来客以65%的速度递增，1988年只增长6.6%，达184万游客。除日本人外，最多的来访者是美国人。日本人1988年来中国的有57万。受中国吸引并到那里旅游的美国人多于西方其他国家。去年到中国旅游的美国人有30万，比1987年少4.6%。旅游部门认为，美国人对前往中国旅游已感到厌倦，欧洲人的兴趣正方兴未艾。1988年前往中国的德国人比1987年增加14.9%，达6.9万人。法国人增加17.9%，达6.3万人。英国人增加15.4%，达9.6万人。不过，上述统计中前往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占的比重相当可观。

最受德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欢迎

的是丽都饭店。这家饭店的德国老板贝尔恩德·里格尔说，饭店房间的占用率达84%，现在可能把房价由¹10美元提高到120美元。这家饭店设在飞机场附近，离市中心相当远，周围环抱的不是庙宇和宫殿，而是建筑工地。这家饭店成功的秘诀在于管理，它设有德国乡村气习的农舍，又有身着民族服装的少女服务，还有英国酒店、肠子店、意大利皮扎店、冰淇淋厅、游泳池和西方迪斯科舞厅，不久还要开设泰国风味餐厅附设花园啤酒店。北京新建饭店的经理们应该向丽都饭店学习。来北京的人无论在起居和饮食上都想要有家乡的气氛，不愿对自己习惯有丢失感；虽身在异国，但仍犹如生活在自己人当中，而不是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尤其是经常东奔西跑的生意人有这种要求，生意人是丽都饭店的主要客源。

如果说丽都饭店生意兴隆靠的是气氛和客人的友情，最近建成的最富丽堂皇的王府饭店靠的就是格兰德饭店的风格。这家饭店位置极佳，离火车站和故宫很近。外国商人在北京经常有一种失意感。王府饭店为此设有德国、意大利、法国

和日本风味的 8 个餐厅，中国餐厅只供应四川和广东菜肴。这家有 570 间客房的饭店是北京高级饭店。有许多活泼的菲律宾人为您服务。

商人们认为，王府饭店和早已建成的长城饭店和香格里拉饭店同属北京的高级饭店。

香格里拉饭店附近又新建一座奥林匹克饭店，这家饭店离“谈判大楼”不远，商人的多数谈判在“谈判大楼”进行。所以这家饭店对商人有吸引力。

拥有1050个房间的北京国际饭店“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归旅行社所有。《中国日报》这种充满自豪的报道也许对大家是一个警告。这家饭店是一流的，备有中国各种风味的菜肴。

老北京饭店是笔者喜爱的一家饭店。饭店充满生机，但决非谈生意的好场所，电报服务极差，电话经常不通。吸引人的地方是这家饭店有一排房间可直接眺望紫禁城，异常活跃的门厅和咖喱间。

香山饭店是唯一讲究建筑艺术的饭店，环境幽静，是休养的好场所。它座落在西山脚下，香山公园内。

远离市区但价格便宜的北京友

谊宾馆对想体验一下中国生活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选择。当然，这里没有西方饭店舒适安逸的环境，也没有咖啡和蛋糕。

另外，每个国家机构都有自己开设的饭店。新建的昆仑饭店形似大火柴盒，开业前就已宣告破产。目前，这家饭店由新华集团占有，原由公安部投资兴建。警察管理不好饭店。

1990年还将有另一些饭店落成，象属于艺术联合会的文化饭店、外交部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和农业企业的花园饭店。

90年代光顾这些饭店的游客包括后来的投资者，现在就应该对价格有所考虑。饭店一多，客人获得的好处是价格下跌。香格里拉饭店在冬季（12月至1月）住宿折价后只需55美元。现有的饭店象丽都饭店寄希望于基本顾客。新建饭店就不得不与原有饭店争夺顾客或寻找新的客源。在美国人减少的情况下，日本人、台湾人和南朝鲜人就是它们争取的目标，鉴于这种情况，饭店的经营管理和价格就不得不随之有所变化。

钱云详

1989年5月8日

汪应果

上海机场难忘的迎接

——归国随想之一

香港《明报月刊》

1989.3

“故障”延误

我回国了。

在美国呆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生活舒适，但我还是想家想得厉害，好几次在大西洋之滨一听到中国的音乐，眼泪都要情不自禁扑簌簌掉下来。

还在回国的三个月以前，我就开始盘算乘哪个航班，走哪条线路了。泛美？美联航？新航？或者是韩航……这些外国的航空公司有的票价低廉，有的服务周到，有的则两者兼备。然而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乘中国民航的班机，这原因不为别的，仅仅是想把手里的一点美元缴给咱们自己的国家——祖国在搞四化，外汇短缺啊！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后，我终于来到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CAAC的服务台前。飞机正点开出应该是下午一时二十分，可是我左等右等，

检票口就是没有动静。出了什么事？我赶紧到电子显示的航班时刻表前去看：糟糕！来自世界各国的航班都是准时，唯独咱们的CAAC是延误。一些美国、台湾的旅客正在议论纷纷，顿时我的脸热烘烘的，仿佛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更让人不愉快的是，延误的寸间并不是干干脆脆的宣布，而是像挤牙膏，半小时半小时地往后挪，让你白等。这种做法也颇有点“中国式”，让你总带点希望，到头来又没有。

好不容易等了四个多小时，飞机起飞了。机长向大家宣布，刚才是因为机器故障所以延迟，特向旅客致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看脚下深不可测的太平洋，手心里不免捏把汗，还没起飞就“故障”了，待会儿飞到中途再“故障”上了又该怎么办呢？

空姐缺高雅气度

总算万幸，飞机没有再闹情

绪，一路十分平安。中国民航的小姐个个漂亮，比其他国家的空姐常有过之，但就是缺人家的那种高雅的气度。我在国外一年多的时间里，也经常乘坐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心里面也常常进行着对比。我想，中国民航的飞机不比人家的差，中国民航的空姐给每位旅客的纪念品、饮料、食品常常超过其他国家的——美国飞机上可口可乐只给一小杯，其它酒类饮料对不起要收钱，可是仍然很少有人说咱们民航上空姐们的好话。究其原因，我想就是缺“气度”。而“气度”二者，就是人们对自己的存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着十分的自尊、自敬。其它国家的空姐在每位旅客面前总想着自己仿佛上了大舞台，一定要全身心地进入自己的角色；而我们的空姐心里的潜台词大概是：“干好干坏管我屁事，反正我只拿那么点工资。”这么一来，原先就身材矮小的中国空姐无形中又矮了一截。

当然，这仅仅是飞行中的一点感触。好也罢，坏也罢，反正是过了太平洋。从“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遍地星光灿烂的日本国上空经过，再飞不久，在一片黑沉沉之中，现出点点寒星，我不由想起唐代诗句“两三星火是瓜州”来——上海到了。

“从没见过这样的航空公司”

就在人们暗自庆幸平安抵达国门的时刻，不料又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机长向大家宣布，由于空中管制的原因，今晚飞机不往北京飞了，要去北京的旅客各带毛毯，到机场候机室过夜。这一宣布不啻是在人群中扔了一颗炸弹，人们不禁哗然，一位台湾的旅客人愤地说：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航空公司！”

然而不管怎么埋怨，人们还是得下飞机。首先迎接我们的是边防警察。大概在国外呆过了眼光总有些改变，总觉得挺别扭：人家的警察膀大腰圆，站有个站像；我们的则颇有魏晋风骨，一个个清峻瘦削，有倚门而立，有捋袖抄手，更有一位干脆蹲在一旁，眼神里既没有亲切的笑意，也没有热情的欢迎，有的只是好奇、淡漠，甚至还有点……嫉妒。当然，这些代表祖国的形象的不佳以及沿途的不快，并没有冲淡旅客们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其中一位在国外读了好几年博士学位的中年女子，一下飞机，激动得一面跺着脚下的地毯，一面大声说：

“我想了多少年，今天总算踏着你了！”说完竟泣不成声了……

我也满怀感慨，随着人流，来到提取行李的传送带旁。传送带工

作得有点没精打采，好半天才出来几个行李，过了一会，竟全停了。有人说：“没有行李了，没有行李了，都不用等了。”我不禁愕然，不仅是我，而且周围还有那么多中外旅客都 没拿到行李，怎么就“没有”了呢？赶紧跑到后面去问，原来是驾驶行李车的工人自行下班了。还有一辆车抛了锚，也没人修，撂在那里。经过旅客们一再交涉，总算来了个带班的，他把行李车开过来，然后拍拍手说：“这回是真的运完了，行李没有拿到的，到登记处来登记。”

“真是出臭气，刚刚回国，就遇到这种事！”说这话的还是那位女博士，她大概在国外朝思暮想再也没料到祖国用这种方式迎接她。

我和女博士还有另外几位美国客人来到登记处。负责登记的是一位年青姑娘，她一面吸拉着鼻涕，一面说：“快点快点，填表！”她说的是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美国客人听得一愣一愣的。我真要赞叹美国人的适应能力，他们在如此恶劣的服务环境中居然一个个都能保持绅士淑女的风度，最多只是耸耸肩而已——当然，他们连话也听不懂，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我只有在旁帮着翻译给那几位客人听。

轮到我时，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的行李丢了怎么办？”

姑娘吸口鼻涕，眼一翻：“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呢！”

“我想……”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我的行李是运往上海的，我只能找你们……”

“找我们？这儿是上海机场，你乘的是中国民航，不是一个单位，懂吗？”

“可是……”我感到问题复杂了。

“找民航去！”她头也不抬，“到纽约去找他们！”

“……”这样的回答简直令我瞠目结舌。

“真烦死了！”姑娘并不理会我的反应，自顾自地发着牢骚，“要不是你们飞机晚点五个多小时，我早就下班了，我都累死了……什么‘空中管制’？他们自己不愿往北京开，就说空中管制！”

姑娘一语道破天机，我这才知道中国民航的机组人员有着偌大的自由！谁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由呢？大得没边哩！

像一台有了毛病的机器

我垂头丧气，那种万里归国的豪情此时早已化为云烟，一肚子怒火却腾地在心头升起。

我拖着随身携带的行李车，走出机场大厅的门。门外冷冷清清地